

张五常 著

经济解释

张五常
经济
论文
选



商务印书馆

经济解释

——张五常经济论文选

张五常 著

易宪容 张卫东 译

朱泱 校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张五常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3132-X

I. 经… II. 张… III. 经济学-研究-文集
IV. 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1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NGJÌ JIÈSHÌ

经济解释

——张五常经济论文选

张五常 著

易宪容 张卫东 译

朱泱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132-X/F·392

2000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1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张173

印数10 000册

定价:27.00元

●张五常曾任阿诺德·C.哈伯格讲座的首任讲师，是位博学多才之人。1967年获加州洛杉矶分校哲学博士学位，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成为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和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任（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主席。

除了研究合约和新制度经济学外，张还是著名的摄影家、书法家和散文家，并且是艺术爱好者，收集绘画、书法作品、古玉器、砚台和古董。

目 录

001

- 1 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 1
- 2 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 29
- 3 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 53
- 4 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 81
- 5 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 110
- 6 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 133
- 7 价格管制理论 162
- 8 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
——租务条例宣称的意图与实际效果 187
- 9 社会成本的神话 214
- 10 租管与重建：香港战前物业的战后经验 270
- 11 玫瑰盆球赛与香港剧院：座位定价经济学 306
- 12 商业秘密的产权问题 329
- 13 企业的合约性质 351
- 14 共产主义制度下为什么缺少自由 380
- 15 产权与发明 387
- 16 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 407
- 17 阿门·艾伯特·阿尔奇安 416
- 18 罗纳德·哈里·科斯 419

目 录

经济解释

19	共有产权.....	427
20	论新制度经济学.....	433
21	在共产主义经济中民主作为改革的工具 是一种祸害.....	472
22	关于腐败的简单一般均衡理论.....	479
23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一个加州大学经济学家 的故事.....	488
24	亚洲金融危机.....	511
25	交易成本范式.....	515
	译名对照表.....	533
	译后记.....	538

1

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

——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
经济讲座教授就职演说

在人生的转折点，人们自然对未来怀着憧憬——是的——但也有怀有极大的焦虑。今晚我站在这里，感到就像一个渴望成为马戏团演员的年轻人。他找到马戏团经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如果表演一次你给我1000元，我就从100英尺高的平台上跳到只有三尺水深的桶里。”

“天哪！”经理惊叫道。“你被雇用了！但是告诉我——你怎么跳而不致粉身碎骨呢？”

“我真的还不知道，”年轻人承认，“我还没有试过”。

现在当我站在自己新职位的跳板上时，我非常感谢香港的许多新朋友。他们不仅鼓励我一跳，而且还伸出了援手，使诸事变得顺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坚信我在跳跃之后仍能自如地行走。

今天晚上还是让我从大家较为熟悉的方面开始讲吧。我请

你们同我一道考察经济学中出现的令人着迷的新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在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应该是什么来分析，这是一种旨在提供政策建议的规范方法。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这是一种立足于推导和检验假说的实证方法。现在对于政策的争论常常根据实证分析和事实发现。政府调控本身现在也被作为它们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来研究。

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比20年前更清楚得多地理解起作用的经济力量。我和我的同事特别幸运，因为在香港，我们做这一高涨潮流的弄潮儿具有不同寻常的优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首先还是让我作一个回顾。

I. 背景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大约30多年以前，乔治·斯蒂格勒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趋势及其后果。在他对效用理论所作的经典性综述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与现实一致的标准应该予以强调——坚持理论要用可观察到的行为来检验其含义。……过去不仅没有探索和检

验这种具体的含义，而且还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在看来要受到经验检验的威胁时，就重新构造理论，以使检验变得无效。……（经济学家们）并不想面对事实的挑战。

他随后继续说到，这种缺点可用下列事实来说明（这里我对他再作一次引证）：

……效用理论进步缓慢。19世纪70年代，流行可加总的效用函数；1909年才推导出正斜率的收入曲线的含义。1881年提出一般化的效用函数；1915年才推导出该函数的含义。……如果对一些理论含义进行了具体的检验，……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寻求建立真正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那么，（他们）就会向我们提供更丰富和更精确的经济理论。^①

在过去的20年，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计算机的进步，以及精巧的经济计量工具的运用无疑加快了这一过程。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但是，必须承认，现在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回避事实的挑战。

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险：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

^① 斯蒂格勒，“效用理论的发展”，载《政治经济学》（1950年8月和10月）。重印于《经济学史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引文出自重印本，第153—155页。

力的方式。欧内斯特·内格尔已警告过这种陷阱,他写道: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经常相当不严谨地使用理论这个词来表示几乎所有的一般说法,而不管它想达到的应用范围是多么狭窄。因而,那些经验概括(它们经常借助于曲线方法,并表示成方程形式)普遍都被贴上了这种标签,而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观察到的统计规律的外推,只适用于那些发生于某一特定社区和某一特定时期的行为。^①

不过,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经济解释的兴趣正在高涨。

II. 潮流的转变

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了下列正确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分析是政策导向的。甚至凯恩斯也说马歇尔欲速而不达。但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方面的发展其相互作用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向。

回顾过去,潮流的转变显然不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工作所造成的;这一转变也不是由某些卓越的创造性思想完成的。相反,就像“以德报德”一样,各种持续的努力其相互作用带来了与我们同在的新观念。

让我从一件不太起眼的事情讲起。1946年,一个名叫

^① 内格尔,“经济理论中的假设”,载《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5月)。

R. A. 莱斯特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证明，边际生产力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论立足于错误的利润极大化假设。^①这是一派胡言。为了驳斥这一观点，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论文。有点难堪的是，我们要等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来提醒我们莱斯特的缺点是我们都已知道的东西：即若 A 意味着 B，说“非 A”意味着“非 B”则是犯了否定前提的错误。^②不过，在 50 年代的那场争论中，还是出现了几篇杰出的论文，^③这些论文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构成可检验假说的那些东西进行思考。

50 年代的另一进步是由芝加哥大学的阿伦·迪雷克托开创的。他关于搭配销售问题的“口头传统”现已成为经典。在始于 1936 年的一件著名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美国司法部指控 IBM 扩张了垄断势力，因为这个正在崛起的巨人要求其顾客在租入计算机的同时购买它出产的纸卡片（这种计算机按现在的标准实际上是巨型的制表机）。原告指出，IBM 通过这种搭配安排将计算机方面的垄断扩大到了纸卡片。

迪雷克托关于这一案件的看法是，垄断扩张论是不成立的。他认为，这种搭配是一种度量方法，通过计算使用的卡片数

① R. A. 莱斯特，“边际主义、最低工资及劳动市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47 年 3 月）。

② 内格尔，《经济理论中的假设》。

③ 阿曼·A. 阿尔奇安，“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载《政治经济学》（1950 年 6 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 年）；唐纳德·F. 戈登，“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可操作性命题”，载《政治经济学》（1955 年 4 月）；加里·贝克尔，“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载《政治经济学》（1962 年 2 月）。

来度量计算机在各种顾客中的使用强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这种度量是必需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搭配安排。不过,在迪雷克托的影响下,芝加哥的同事和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①

虽然这一题目本身或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搭配销售的含义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们染上而不觉。这是因为这些含义扩展到经济研究的新领域和经济研究的新方法。解释代替了纯理论的政策建议。例如,在反托拉斯诉讼案中,普遍的看法是,垄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垄断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这代表了最标准的规范经济学。迪雷克托的上述研究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在不知道出现的原因一种现象时对它作出判断呢?

而且对搭配销售的调查提供了对定价行为的第一个具体研究。在那以前,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甚至直到今天,教科书仍然只告诉我们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们很少指

^① 小伍德·S. 鲍曼,“搭配安排及其影响问题”,载《耶鲁法学》(1957年11月);乔治·希尔顿,“搭配销售及一条龙强迫”,载《世界经济档案》81(1958年);迈耶·L. 伯斯坦,“搭配销售经济学”,载《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60年2月);同上,“一条龙强迫理论”,载《西北大学法学》,55(1960年);瓦尔特·奥伊,“迪斯尼乐园的两难处境:米老鼠垄断的两部分关税”,载《经济学季刊》(1971年2月)。

在我看来,如果仔细考察,现有的提出来解释搭配销售的假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价格歧视假说是错误的,因为就直接标示出价格的财产来说,其价格对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价格歧视”仅存在于另一些并不直接标示出价格的财产。如果把这定义为“价格歧视”,其他所有的交易也应该这样定义。另一方面,消费者剩余获取假说并没有提供任何可操作的方法,来把各种类型的搭配安排区别开来。这一缺陷由于每一种交易都需要某种类型的搭配而加重了——例如,左脚鞋是与右脚鞋“搭配销售”的。

出定价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约束条件。它们也没有说明价格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各种含义。简言之，迪雷克托及其同道打开了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的潘多拉盒子。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这种需要出现于有关分成问题中。分成像垄断一样，被人们认定是“无效率的”。1966年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抛开无效率的观点，仅仅诘问“被称为分成的这种特定形式的合约为什么会存在？”^①这个问题在那时看来很新鲜。回顾过去，我感到我那时实际上是在对我以前接触过的病毒——搭配销售和其他定价行为“为什么会存在”——的一种反应。

或许，这种潜伏的病毒也是学生们觉醒的原因，他们在课堂上常问“为什么”。提出关于定价和合约安排的问题很容易，但答案却常常难以捉摸。而且今天的好答案在明天就可能成为低劣或错误的解释。无论如何，提出难题使老师难堪较为容易。但这也是让学生了解经济研究之科学性质的有效途径。

20世纪50年代推动实证经济研究（解释）的另一动力也起源于芝加哥学派。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各布·明塞尔以外，现在被称为“新”劳动经济学的所有著名的倡导者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整个一批精湛的研究留下了加里·贝克尔、格雷格·刘易斯、艾尔伯特·里斯、T. W. 舒尔茨及其弟子的大名。其实，

^① 参见本书的“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至于其他较早的关于定价行为的论文，可参见莱斯特·特尔塞，“制造商为什么需要公平贸易？”，载《法律和经济学》（1960年10月）；乔治·J. 斯蒂格勒，“批量订购之注释”，载《最高法院评论》（1963年）。

更早一些的马歇尔和费雪已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①但是, 50 年代的发展使这一主题纳入了选择理论的框架。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题扩大到包括整个人类事务——家庭、婚姻和离异、劳动流动等等。工资也在种族、性别、年龄、训练和教育的框架内被研究。只有在计算机时代才能产生业已出现的这些深刻而全面的经济计量著作。其目标不过是解释职业选择。^②

进入 60 年代,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推动了经济解释潮流的高涨。第一个是货币大论战。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失业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争论的一方认为造成波动的祸首是经济本身:像一句话说的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另一方则坚持认为不稳定的货币供给是毛病所在。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这有别于凯恩斯本人)认为不受欢迎的波动是由经营行为的转变引起的——因此证明私人企业活动中需要政府干预。“完全不是这回事!”另一方面争论说,“政府不适当地调整货币供给才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 8 版(伦敦,麦克米伦,1920 年)第 4 卷及附录 E;欧文·费雪,《利息理论》(1930 年),第 1 章。

② 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包括:加里·S·贝克尔,《歧视经济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 年);“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分析”,载《政治经济学》(1962 年 10 月增刊);《人力资本:理论和经验分析,兼论教育》(纽约:全国经济研究所,1964 年);“时间分配理论”,载《经济》(1965 年 9 月),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载《政治经济学》(1958 年 8 月);“在职培训:成本、收益及一些含义”,载《政治经济学》(1962 年 10 月增刊);“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载《劳动经济学的几个方面》,H. 格雷格·刘易斯编(大学——全国经济研究所会议系列 14,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 年),艾尔伯特·里斯,《工会经济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 年);H. 格雷格·刘易斯,《美国的工会制度和相对工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 年);西奥多·W. 舒尔茨,“教育带来的资本形成”,载《政治经济学》(1960 年 12 月);《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纽约:自由出版社,1971 年)。同类的其他出色著作多不胜数。

是真正的祸根”。

这两方的分歧并不在于一般的理论框架，相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预期的调整、货币需求与投资需求这类参数上。争论的起点十分规范化。但当争论吸引了以弗里德曼和托宾为首的当代最优秀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时，研究就转向了经验调查。^①结果表明，货币主义者（这本身是一个暧昧的词）赢得了胜利。但最近的事件表明，争论还没有结束。特别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美国最近的情况：为什么在通货膨胀下降以后利率还长期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

60年代的第二个重要知识进展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这就是明确认识到作为行为约束条件的产权和交易成本。这一点为什么在以前被忽略了？或许这种忽略可追溯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方程式中。根据这一范式，市场受虚构的“拍卖者”和同样虚构的“监督者”主导。这两者的服务被假定是免费的；所有的行为权利都被看成是绝对拥有的产权。但在实际生活中，拍卖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信息和合约协商也有很大的成本。这些约束条件在一个人（或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并不存在。概括起来，它们被称为“交易成本”，它

009

^① 对争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的一般讨论见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原因和后果》（孟买，亚洲出版社，1963年）；“货币政策的作用”，载《美国经济评论》（1968年3月）；“诺贝尔讲座：通货膨胀和失业”，载《政治经济学》（1977年6月）；J.托宾，“通货膨胀和失业”，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3月）；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罗伯特·J.戈登，“通货膨胀和失业理论的最新发展”，载《货币经济学》（1976年）。

们一旦被认识，就给经济调查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由于这个因素，现在正在深入地研究不同产权结构下竞争的意义以及为什么选择特定形式的合约和经济组织。

早在 30 年代，这些约束条件已被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奈特和凯恩斯注意到。^①但经济学家们总体上还是沉迷于充当政策建议者的角色。他们并不想被不能解释的现象分心。所以他们把所有失常都称为“市场不完全”，以此搪塞过去。罗宾逊和张伯伦的著作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②甚至在更早一些，马歇尔就通过区别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发明了一种应急方法。

但是，在 60 年代，对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高涨兴趣就不可能这么容易地被转移开了。双重的关心吸引了肯尼思·阿罗、乔治·斯蒂格勒、阿曼·阿尔奇安，特别是吸引了一个在美国教书的超常智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注意。^③几年以后，

① F. H. 奈特，“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载《经济学季刊》（1924 年 8 月）；F. A.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载《美国经济评论》（1945 年 9 月）。这一较早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 R. H. 科斯，“企业的性质”，载《经济学》杂志（1937 年 11 月）。莱荣霍夫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凯恩斯的《通论》涉及到交易成本概念，前引著作。

② 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伦敦，麦克米伦，1933 年）；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 年）。

③ 肯尼思·J. 阿罗，“经济福利和创新资源的配置”，载《创新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普林斯顿，全国经济研究所，1962 年）；乔治·J. 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载《政治经济学》（1961 年 6 月）；阿尔曼·A. 阿尔奇安，“产权经济学”，载《政治学》杂志第 4 期（1965 年）；《定价与社会》（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67 年），不定期论文，第 17 号；R. H. 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载《法律和经济学》（1959 年 10 月）；“社会成本问题”，载《法律和经济学》（1960 年 10 月）。

除了奈特 1924 年的重要论文以外，关于产权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 H. 斯科特·戈登的“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载《政治经济学》（1954 年 4 月）。戈登的著作是从奈特的著作派生出来的。

哈罗德·德姆塞茨及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①受这些正当走红的名师的教诲，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是我的最大幸运。由于他们，我现在讲起来才有信心。

在任何科学中，新的发展很少这么快就成为一种范式。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却很快就明确无误地成为了一种范式。奇怪的是，“科斯定理”一词的流行^②。这个词科斯本人都试图否认，他说他关于产权的命题并不是定理。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011 —

① 哈罗德·德姆塞茨，“产权的交换和执行”，载《法律和经济学》（1964年10月）；同上，“关于产权理论”，载《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阿曼·A. 阿尔奇安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12月）；阿尔奇安和鲁本·凯塞尔，“竞争、垄断和追求货币收益”，载《劳动经济学的几个方面》（普林斯顿，全国经济研究所，1962年）；本书的“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哈维·艾弗奇和L. L. 约翰逊，“调控约束下的企业行为”，载《美国经济评论》（1962年12月）；约拉姆·巴泽尔，“按等待分配的理论”，载《法律和经济学》（1974年4月）；“税收分析的另一种思路”，载《政治经济学》（1976年12月）；安东尼·伯顿利，“土地共同所有对黎波里塔尼亚资源配置的影响”，载《土地经济学》（1963年2月）；詹姆斯·M. 布坎南，“公地上的拥挤：政府干预的一个案例”，载《政治学》杂志（1968年）；布坎南和W. 克雷格·斯塔布尔宾，“外部性”，载《经济学》杂志（1962年11月）；路易斯·迪莱西，“产权对政府投资选择的含义”，载《美国经济评论》（1969年3月）；埃维西·多马，“苏联的集体农庄”，载《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9月）；杰克·赫希莱弗，“我们在信息理论的何处？”，载《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5月）；约翰·麦克科尔，“信息和工作搜寻经济学”，载《经济学季刊》（1970年2月）；彼得·A. 戴蒙德，“价格调整模型”，载《经济理论》（1971年6月）；埃里克·G. 弗鲁博顿和斯维施扎·皮约维奇编，《产权经济学》（巴林格，1973年）；菲利普·纳尔逊，“信息和消费者行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0年3月）；迈克尔·罗思希尔德，“不完全信息下的市场组织模型概述”，载《政治经济学》（1973年11月）；萨姆·佩尔茨曼，“公共和私人企业中的定价：美国的电业”，载《法律和经济学》（1971年4月）；理查德·A.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2版（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经济调控理论”，载《贝尔经济学和管理科学》，335（1974年）；奥利弗·威廉姆森，《自主行为经济学》（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1964年）。

② 这个词可能来自乔治·J. 斯蒂格勒，《价格理论》，第111页。